

员工:不发年终奖,存不下钱

企业:发了年终奖,仍有人走

年终奖能否留住年轻打工者

本报记者 赵昂

10月通常是年终考评的关键月份,对于许多企业而言,年终考评往往与员工年终奖挂钩。但是,许多80后、90后年轻打工者却对年终奖没有奢望,他们更在意春节后能否找到新的工作,一些人甚至现在就已经着手准备求职。

据调查显示,七成年轻打工者对于能否拿到年终奖“没信心”,在上个月,有半数的打工族已经跳槽或准备跳槽。不过,据记者在北京的实地采访发现,很多年轻打工族跳槽,并不只是为了薪水。

工资月光的无奈

来自山西农村的王拓,在北京市朝阳区的一家洗车店打工。“每周只休一天,一个月给3000元工资。”3000元的工资,在北京过得紧紧巴巴,除去房租、交通、伙食和手机开支,一个月几乎没有剩余,“想买双便宜的鞋都得攒段时间。”打工好几年,王拓几乎没有多少存款,“如果年底能发笔钱,我就能存下来了。”但他并不奢望洗车店到年底会给他这笔钱,“年终奖都是大企业里才有的,我们

打工的老板,都是私营小老板,自己也要赚钱,怎么可能发给你?”他之前还在洗衣店和饭馆打过工,没有一家给过他年终奖。

而王拓的店老板则向记者坦言,从来没有过年终奖这回事。“我在这里干活的,没有几个能超过两年,很多小伙子干几个月就嫌苦走了,有的学了点修车技术就去别的地方干了。所以我也从来没考虑年终奖,因为大部分人都熬不到年终。”

通常情况下,餐饮、超市等劳动强度和技术含量均较低的工作,打工者得到的报酬更少。在一家中式快餐店打工的李冰告诉记者,她每月实发到手的工资就是北京市最低工资。只有政府调高最低工资时,店里才会给全职员工加月薪,非全职员工加时薪,年终奖自然更是无从谈起。“据说只有总公司的管理人员才有,到我们这里可能也就执行店长会有。”但是,即便拿着最低工资,当着“月光族”,但李冰从来没有想过离职,因为这活儿“干净、轻松,休息时间多,同事关系简单。”

不过,这些事情,李冰的经理却不能理解,因为经理也觉得,总公司定下的薪酬有些低,“其实我很奇怪这些年轻女孩为什么甘心在这里干,如果去一些小吃店打工,虽然胜些

但能挣到三四千元一个月,不过既然她们甘心,企业也就只给这么多。”

没有规划的跳槽

在东城区一家网吧打工的刘志栋,是这家网吧的“网管”。之前他曾在企业里当过保安,在快餐店送过快餐。每一份工作都只干一两年,不过,他发现自己身边的其他打工者往往也是如此。在他看来,打工族对于企业并无多少忠诚度。每一次跳槽的理由都不同,有的是公司关了或者不再用人,有的是嫌薪水低,有的是和主管不合,不一而足。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就是都没有年终奖。“公司根本没打算让你一直干,你也没打算在公司长期干,双方都明白。所以不会给你年终奖,也不愿培训你,民营小公司里,能提拔的都是老板同乡。”

但现在回想起自己的打工岁月,刘志栋有时觉得,频繁的跳槽,最终让他感觉自己“什么都没学到”,钱也没有存下多少。“干了这几年,薪水是涨了,刚开始也觉得特开心,后来发现,身边人都拿这么多了,物价也贵了,其实还是相当于没有涨。”刘志栋发觉,自己要有个人生规划,这两年在网吧打工,学会

了如何维修电脑,管理网吧。他曾计划过两年回老家开自己的网吧,但又有另一份担心,“在小地方开店面,麻烦事情很多的。”

“员工防着老板不用自己,或者老板不干了,但老板也防着员工走。”在北京开了多家连锁理发店的一名老板告诉记者,“小工们给客人洗头时,其实都在偷着瞄师傅,学怎么理发。学会了就自己跑了,去别的地方干。我也想留住他们,但不知道怎么留,怎么鼓励他们。”

企业老板的苦衷

对于年轻打工族的吐槽,企业经营者们也有难言苦衷。胡先生经营着一家中等规模的饭馆,为了留住骨干员工,他在开业的第二年,给员工发了年终奖。“希望他们在春节之后还能回来继续干。”结果许多人拿了年终奖后,便一去不返,甚至连招呼都不打。

如今,他不仅不愿发年终奖,而且也不愿意在员工培训和团队训练上投入过多。“餐厅周边高档小区多,过去还请过老师教员工基本外语口语,现在也不搞了。刚培训完人就走了,后厨做菜的也是如此。”人力成本过高,员工流动性过大,导致不少中小企业不得不压

缩这些“无效”开支。

开健身中心的朱先生也有同样的困惑。刚开业时,学过工商管理的他非常注重“员工激励”,甚至不惜停业两天组织员工去郊区搞拓展训练、旅游爬山。“算上租车、住宿、餐费,一个人平均花了好几百元,但效果却很一般。”后来有财务员工私下对他讲,“老板,大家议论还不如把钱直接发给我们,我们自己找地方去玩呢。”后来,朱先生发现,自己当年打工时希望得到了东西,与现在的年轻人大不相同了。

有人力资源专家告诉记者,如今的年轻打工者在选择工作单位时,更看重现金薪酬以及工作的舒适程度。“在1000元的福利项目和800元的现金之间,他们往往选择后者,因为可以用现金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现金对他们的激励效果更强。这点与在物资较为匮乏年代出生的员工不同。还有一点,在拿加班费和回家休息之间,在高工资劳动强度大与低工资劳动强度小之间,他们中的多数人,往往也倾向于选择后者。年轻员工更看重工作与生活的平衡。”但是,企业的管理者,往往还是以70后居多,“这就导致管理者做出的激励,与90后员工的实际需求往往对不上路子。”

8名农民工获新疆见义勇为英雄模范称号

本报讯(通讯员景双喜)10月17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七次见义勇为英模表彰大会隆重召开,来自河南的农民工杨付应被追授为“见义勇为英雄”称号,甘肃籍农民工乔永刚等5人群体、高世川等4人群体分别被授予“见义勇为英模群体”称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号召全区各族干部群众向他们学习,使其成为促进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强大动力。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努尔·白克力指出,此次受表彰的外来务工人员是历年来获奖档次最高、人数最多的。他们虽然来自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民族,年龄性别不同,但在当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受到威胁的关键时刻,临危不惧、挺身而出,用热血和生命奏响了一曲震撼人心的正气之歌。

工会“意见书”恢复农民工“保安身”

本报记者 黄榆

别以为当个保安容易,在特定情况下,是不是保安,还需要法院审理一番,才会有定论。

2014年3月14日,听到自己诉求被安宁市人民法院判决胜诉,“老保安”游绍良总算觉得欣慰了。

为了证明自己曾是保安,他自2012年7月就开始了这个“证明”的历程,反映、求告,直至劳动仲裁都不能证明,最后还是工会帮了他。

出事的时候,安宁市草铺镇下古屯村的游绍良56岁,年近花甲还做保安,游绍良当然有自己的难处。2011年12月30日,时年55岁的游绍良来到一家保安公司应聘,当上了保安,被派遣到位于草铺的昆钢新区保安中队工作,到2012年6月10日时,他干了正好半年。

这天17点50分,他骑自行车在去高山水池上班的途中摔倒,致左脚骨中下骨骨折,伤情严重,保安同事宋某发现游绍良受伤后电话向保安队长请示,然后用电动车将游绍良送到草铺卫生院救治,卫生院一看伤情严重,不敢接治,宋某就将游绍良送回家中。

自此以后,保安公司便对游绍良的伤情及医治情况不闻不问。游绍良想到了草铺街道工会联合会农民工维权站的朱绍宏。他是草铺街道工会联合会的常务副主席,农民工维权站站长,经验丰富,处事老到,专门做维护农民工权益工作。

游绍良案件发生后,7月17日,朱绍宏带人来到昆钢新区建设指挥部,通过指挥长将保安队长余光华叫来协商解决游绍良受伤一事,余光华以“不知情,需要向公司汇报”为由推诿,协调调解未果,但这时,朱绍宏叫周兴林拿出一份《工会维权意见书》叫余光华签收,余光华看完后,因没有单位印鉴,就在《意见书》上的“被监督单位”一栏下签了自己的姓名。

这份《意见书》有这样内容,“据职工反映,经调查和了解,你单位在保障职工劳动安全和生命健康权利工作方面存在以下问题:你公司员工游绍良在上班期间发生意外伤害,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三章第十四条之规定,请你单位对上述问题认真研究,及时协调和处理……”

“后来这家保安公司玩名堂,销毁了所有证据。”采访朱绍宏时,他仍然激愤不已。2013年3月13日,朱绍宏作为游绍良的代理人出庭为之辩护。3月14日,依据这份《意见书》,法院作出判决:“原告游绍良与被告云南ZHH保安服务有限公司从2011年12月30日起存在事实劳动关系。”



环卫工之殇

10月26日是第18个广西环卫工人节,环卫部门呼吁关爱环卫工人。

①今年3月30日凌晨4点,柳州市环卫工人梁玉娟在清扫隔离栏下面的垃圾时,被一辆大货车撞飞,当场昏迷。目前她生活不能自理。

②10月11日,广西柳州,两年前在清扫路面时被电动车撞倒的柳北环卫所环卫工人张文平留下了嗅觉失灵的后遗症。

③10月12日,广西柳州,王立远去年被车撞飞,造成二级伤残。

CFP供图



农民工“棒棒军”工会主席

本报记者 李国

本报通讯员 赵杰昌

在山城重庆,有这样一位平凡而又特别的进城务工人员。他靠当“棒棒”,下苦力维持生计,用真诚、善良的心热情帮助和感动了许多人。从“棒棒”到农民工工会主席再到社区志愿者,他一路传递着社会正能量,书写了一段令人感慨的草根传奇。

在当“棒棒”的日子里,许生坚持助人为乐、诚实守信和不损坏不丢失货物的原则,处处为服务对象着想,坚持合理收取报酬。

时间一长,他就成了三峡广场一带最有影响力和最有信誉的农民工代表。

在当“棒棒”的日子里,许生坚持助人为乐、诚实守信和不损坏不丢失货物的原则,处处为服务对象着想,坚持合理收取报酬。

说。

老家在丰都县保合镇文家边村的老许,家里有七兄妹,他是老大。其他的兄弟早年外出打工,他就守在老家种田,照顾年迈的父母,在几兄妹中,许生的经济条件最差。

为了摆脱困境,1992年,许生来到主城区沙坪坝打工。由于没有什么文化,许生求职四处碰壁。无奈之下,他成为三峡广场“棒棒军”中的一员。

在当“棒棒”的日子里,许生坚持助人为乐、诚实守信和不损坏不丢失货物的原则,处处为服务对象着想,坚持合理收取报酬。

时间一长,他就成了三峡广场一带最有影响力和最有信誉的农民工代表。

敢替“棒棒”说话

由于敢于替“棒棒”说话,许生深得工友们的信任。2005年,他当选为渝涪路街道农民工工会主席。

“老板,要‘棒棒’不?”“老板,喊我,喊我”“这是我的业务,你来争啥子”……这是几年前,在三峡广场新世纪商场门口经常可以看到的事情。

那个时候,一旦看到有顾客提着大包小包东西走出商场,马上就有一群“棒棒”蜂拥而至。

进城加入“棒棒军”

今年58岁的许生,目前身兼三职:渝涪路街道农民工工会主席、双巷子社区夜巡队队长、社区农民工志愿服务队队长。尽管拿钱不多,他管的事儿不少。短短时间的采访,他就被无数个电话打断,鸡毛蒜皮的事儿,社区居民都喜欢找他帮忙。“习惯了!”许生

而上,争先恐后抓拉顾客的东西,让许多顾客不堪其扰,同时“棒棒”之间也经常发生争吵打骂的情况。

“这个样子要不得,太影响城市形象了。”许生曾当过生产队队长,他决定当一名义务调解员,避免“棒棒”之间的不良行为影响城市形象。要化解矛盾,得说到他们心里。许生懂得这个道理,在空闲的时候,他就组织“棒棒”们在一起,说道:“我们出门不容易,大家都是靠体力挣钱。如果因为抢生意打架,打伤了划不来。把别人打伤了,要挑好东西才够付医药费。”

许生虽然文化不高,但是说话在理,“棒棒”们都听进去了,在他的建议下,如今,在新世纪商场前面的梯坎上,“棒棒”们排排坐,排队等活干,再也没有出现“抢”顾客的现象。

社区当起志愿者

许生经常搬东西和双巷子社区干部有接触,他们对许生的为人比较了解。2004年,在社区的推荐下,他当上了一名夜巡队员。由于工作踏实认真,他当上了夜巡队队长。每次带队夜巡,许生都格外留心谨慎,积极关注社区的安全情况。

年前,他购买了一套小户型的二手房,真正融入到城市生活。虽然自己有房子,但为了能保证随喊随到给居民提供帮助,他把房子租了出去,在社区旁边的双巷子15号小区租房住。

“许师傅,我家客厅的电灯坏了,有没有时间麻烦帮我看一下。”9月6日中午,住在双巷子社区15号的纪远祥向许生求助。接到电话后,在家看电视的许生带上工具箱,来到纪大爷家检查线路,很快就给他排除了故障。纪大爷今年66岁,是一名独居老人,行动不便,经常为买米、买菜犯愁。

“现在我们有4个夜巡队员,晚上8点左右开始到背街小巷喊话,晚上10点到次日凌晨2点左右,在辖区内外巡逻。”许生告诉记者,虽然夜间巡逻有点辛苦,但能为居民守护平安,队员们都很高兴。

2008年,四川汶川大地震后,许生组织几十名“棒棒”在三峡广场为灾区捐献爱心。因个人事迹突出,这一年,他荣获“全国优秀农民工”称号,2010年,他向社区递交了入党申请书,成为一名预备党员。

“街道、社区很关心进城农民工,让我们充分感受到了家的温暖。没有政府的关心、帮助,我不可能在城里立足。为社区做力所能及的小事,我很乐意。”许生告诉记者,在他生活比较困难的时候,社区不但安排他当夜巡队员,还安排他在社区值夜。

于是,许生就思索着用自己的行动回报社区的关爱。许生主动加入到“社区代办站”,成为一名替老百姓“跑腿”的志愿者。哪户居民家的下水道堵塞了,电灯泡坏了,只要有时间,他都会很乐意上门为大家免费服务。

许生靠多年的打拼,渐渐有了积蓄。凡

是许生的两个儿子已在重庆工作,一家人衣食无忧。许生再不需要当“棒棒”下苦力挣钱养家,但是他闲不住,全身心投入到志愿服务中。许生表示,只要居民有需要帮助时,他就会义务为大家服务。

如今,许生的两个儿子已在重庆工作,一家人衣食无忧。许生再不需要当“棒棒”下苦力挣钱养家,但是他闲不住,全身心投入到志愿服务中。许生表示,只要居民有需要帮助时,他就会义务为大家服务。